

SHIJINGYINGYIYANJIU

《诗经》英译研究

◎ 李玉良 著



齐鲁书社

《诗经》英译研究

◎ 李玉良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英译研究 / 李玉良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11

ISBN 978-7-5333-1873-4

I. 诗… II. 李… III. 诗经—英语—翻译—研究
IV. I207.22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284 号

《诗经》英译研究

李玉良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 32

印 张 13.25

插 页 3

字 数 333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73—4

定价: 30.00 元

一部人类文化交流史的新作

——李玉良著《〈诗经〉英译研究》序

我过去读《诗经》只是从文学的视角,感到它的确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有诗,有歌,有乐,其文学艺术的开创价值不可估量。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 500 多年间,编辑成书约在春秋后期,据说孔子曾删订过。汉代有齐国辕固、鲁国申培、燕国韩婴和鲁国毛亨四家传授《诗经》,到东汉毛诗被认同,逐渐盛行,其他三家渐渐衰落以至亡佚。现在所见《诗经》,即为毛亨所传。《诗经》305 篇,堪称古代人类社会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伦理、天文、地理、农业、手工业、民俗、文艺等。古人先把它列入五经(《诗经》、《尚书》、《周易》、《礼》、《春秋》),后又列为十三经(《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可见它在经学中的重要地位。

《诗经》的百科性古人早已开始关注,其研究除正义、训、笺、疏、通释之外,已有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专释《毛诗》中的草木鸟兽虫鱼,共 132 条。每条先节取原诗句为条目,再训释动物、植物的形状、习性、异名、名义等,比如:

采采芣苢:芣苢,一名马舄,一名车前,一名当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车前、当道也。今药中车前子是也。幽州人谓之牛舌草,可煮作茹,大滑,其子治妇人难产。(见马文熙、张归璧《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56页。)

宋人蔡卞撰《毛诗名物解》。卞(约1048-1117年),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进士,官至观文殿学士,王安石婿。该书20卷,1-14卷释天,释百谷,释草,释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释马;15-20卷为杂释、杂解。(同上书,第1056页。)

据考证,西周时期的《诗经》中与化学知识有关的内容就有600多处,其中,青铜100处,酿酒100处,染色80处,玉石40处,皮革30处,香料10处,肥料5处,油漆和陶瓷10处,糖和油脂30处。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少的科技术语。(见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诗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是研究人类早期各类问题的宝贵资源,除了上面说到的内容之外,还可发掘人类早期神话、宗教、语言(语音、文字、语义的形态及其关系)、认知模式(先民认识世界的模式)等文化形态的特征及其根源。

黑格尔说过,人类有两大智慧源头,一个在古希腊,一个在古代中国。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产生了荷马(Homeros)史诗《伊利昂记》(《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奥德赛》),跟中国的《诗经》是同时代的人类文化元典。如果在这两个元典的异同及其根源进行比较研究,那一定会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西这两大不同类型文化的本质。

研究《诗经》是翻译《诗经》的基础,也是研究《诗经》翻译

的基础,如果没有对《诗经》研究的这个基础,那后边的翻译和研究肯定都是难以做好的。

玉良的《〈诗经〉英译研究》不仅梳理了《诗经》研究流变的历程和《诗经》英译的历史发展,而且对《诗经》翻译的经学、文学、文化、诗学以及译本比较、文化传播、典籍译论等重要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从性质来说,这可算是文化交流与传播史的研究。本书资料丰富,兼顾微观和宏观,为多视角多学科研究《诗经》翻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玉良是个治学严谨的年轻学者,他对自己的研究作出了科学的估价,请看他在全书“结束语”中的一段话:

前哲有言:理论是对光明的寻求,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那么我们既有对《诗经》英语翻译的观察,就应该反过来进行足够深入的反思和有系统的总结和抽象,形成一种理论。但我虽有总结,却是零散的和感悟的,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和普遍性。我在研究过程中亦曾一直努力捕捉着变幻无穷的种种现象,期望着真理的呈现,但当我试图将感悟转化成为语言时,却担心着那一点点可能的真理会为羸弱而片面的语言所遮蔽。因此,我期待着理论家能在我的研究基础上以更加锐利的理论目光、形而上的思维和精湛的语言对《诗经》翻译的理论蕴涵进行系统有力的阐发。

我殷切希望玉良不久就成为他期待的那样的理论家,因为他不但应该而且能够成为成就卓著的理论家。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愿,而且一定是读过此书的每个读者的心愿。

是为序。

杨自俭

2007年11月4日

记于中国海洋大学六三居室

学有缉熙于光明

——序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

记得写过一首小诗,是关于风的。

近日玉良寄来他的书稿《〈诗经〉英译研究》,嘱作序,便想起这首和《诗经》有关系的诗来。兹录于下:

风

风从四极八荒涌来
带着尖锐的刺
空在中央积聚着云雨
天下遂化为一道风景

这首诗写于2003年3月17日夜,玉良当时还没有跟我读书,可是《诗经》的情结早已在我的心里凝结,或许还要早些。回想起来,分明是在上世纪在古城西安工作的时候,我与叶舒宪相交较多,那个被我们唤作“小列宁”的才子,当时在研究《诗经》。他说过中国是一个风的国度,对我影响颇深。再往前不易追溯,或许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断使我坚信,诗歌的诞生是人类文明早期心态的表露,和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总之,无论如何,《诗经》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和中国诗歌的源头,在我的心里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是我的学术视野所

时常关注的一个自己尚未涉足的领域。除了读过一两本《诗经》，还有一本《〈易经〉古歌考释》使我爱不释手。这本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的书，将《易经》中的韵体摘录出来，使其单独成篇，发现里面隐藏着大量的古代歌谣，于是推测《易经》起源于对这些古代诗歌所反映的早期先民的生活与命运的哲学解释和理论说明。其中所蕴涵的观点，似乎说明像《易经》这样典型的占卜、哲学著作，也是从早期的诗歌中得到启发，才生发出来一些哲学思想，成为一部旷世奇书的。后来《诗经》这部古代北方的诗歌总集，自己也成为经典，这在一个把诗歌看得至关重要的民族那里，本无可厚非，但中国文化对于诗歌的实用化的态度和伦理政治性的利用，却是一部《诗经》研究史所难以回避的。也许，要真正读懂《诗经》，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就不仅要懂得《诗经》版本的散佚与流传散播的曲线，而且要懂得《诗经》如何被伦理政治化的过程，也就是它特殊的人文教化作用——这已经和上面那首诗的“风”（讽）和“刺”以及“云雨”的双向运作的隐语相吻合了。

当然，《诗经》作为中国源头文学的诗歌总集，并不局限于“风”，也就是民间文学，反映民间疾苦、社会风俗与人民愿望的“国风”，还有体现贵族生活方式和高雅情趣的贵族文学“雅”，包括“大雅”和“小雅”。有趣的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在官与民的统治与反叛的反复斗争中，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得以减弱，“大雅”之不易存只有“小雅”还在了（不是指具体的诗而是指精神实质），因而对于民间情趣的雅化和文化品位的提高所起作用甚少，而作为“颂”的庙堂文学则高高在上，宗庙社稷的政治与宗教合一，出于史官的历史与政余弄文的官方文学不分，共同起着文明教化的作用。当然，由于贵族阶层的被打击与消磨，因而缺乏一个适合的调停和中介，也由于宗教文化的弱

化或先天不足,以及世俗文化的逐渐发展与发达,庙堂文学的绝对精神高度也有一定的局限,所以影响了它的政治学的纯洁和神学的以至于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与精神追求,终于使得单纯的“颂”的文学功能难以为继了。于是,一面有自下而上的讽喻与美刺,一面有自上而下的教化与约束,同时伴随着歌功颂德与皇恩浩荡(例如在儒家官本位文化价值观里所反映的那样),以及牧民、保民、安民、敬民的各种治理机制,和王权统治下的贪官、清官、忠臣、奸臣的二元划分,于是,二者之间的“上位文化”与“下位文化”的对立与融合就构成中国文化的典型的风景了。由此可见,在《诗经》风雅颂的三分法里,不仅包含了中国文学的三元系统的完整结构,而且包含了中国文化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内核和双向互动的运作推进机制了。

作为文学艺术的源头之一的《诗经》,开创了中国文学的赋比兴传统的先河。近世以来,让《诗经》回归文学的研究上的努力,当然是值得关注和赞许的,然而,《诗经》研究何曾有一日离开过赋比兴?即便是儒家伦理政治视野中的《诗经》研究,甚至宋明理学视野中的《诗经》研究,也一直是利用甚至推进了赋比兴的认识的。例如,朱熹对于赋比兴的经典界定,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解释。所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以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所以,今日对于《诗经》的文学价值的认识,不是一概否定儒家的《诗经》研究成果(何况儒家文学也是中国文学之一途),而是继承其精华和精神,在新的研究方法和包容的视野中予以推进和加深,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并发掘出新的成果来。这样,《诗经》研究的领域和论题就会大大超过古代的《诗经》学传统,进而出现新的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初步想来,今日的《诗经》研究可能有如下领域或论题:

1. 关于诗歌起源乃至文学起源的认识,涉及到诗歌与一般文学的共同点,与宗教、生产及艺术的关系,以及诗歌作为文学主流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知识考古价值。

2. 《诗经》中包含的社会认识价值,例如古代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婚姻制度、民间风俗、价值与信仰系统,以及其他方面的认识,可以笼统地归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3. 《诗经》中所描绘的名物,包括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物质形态的事物的状况及其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这一部分研究基本上是考据性的,构成人类和自然关系的一部分。

4. 《诗经》的语言学上的认识,作为古代的语言可有方言地理学上的分布,语音、词汇、语法与修辞方面的知识,以及古文字、音韵等可以构成中国古典语言学的一个宝库,是用之不尽的。

5. 《诗经》中文学意象系统的研究,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它不仅对外通向自然与社会对象,而且对内通向人的心理与精神现实,在中间又离不开语言的中介附着作用。

6. 围绕《诗经》的主题和形式所产生的历代文学与艺术作品的研究,例如绘画作品、音乐作品、其他文学作品的研究,构成《诗经》影响的一部分和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7. 《诗经》研究的历史与演变规律的研究,包括各种意识形态(儒释道及官方)对于《诗经》的改造与解释,原型的、伦理的、文学的、艺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意义阐释与价值发觉。

8. 《诗经》以各种文本形式,包括注释与疏解、今译和外译,特别是英译本在中国以及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的研究,同时也包括这些译本的回译与往复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反哺行为的研究。

当然,以上的提示并没有穷尽《诗经》研究的范围和题目,

只是一个粗略的提纲而已。要之,《诗经》研究也可以按照传统国学的精神,分为考据、辞章、义理等研究领域,当然同时也要融合新的西洋的研究方法,使其丰富与更新,例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诗学的研究方法,甚至神话原型批评以及心理学与文学研究方法等等。玉良的这本《〈诗经〉英译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学术背景下选题、写作和完成的。

和玉良的结识,多少也缘于诗歌和哲学。

有一次玉良在我的书房里夜谈,看到我新写的一首现代诗,记得是《冰河》,我让他给我讲一下大体的印象,他看了一遍,就直说出反映的是现代人的存在紧张与精神焦虑。我发现他懂现代诗,不禁心中暗喜。因为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认识,不懂诗歌不足以言文学,而不懂现代诗,则不足以言诗歌。后来,大约在玉良被录取为博士生以后,当我得知他数年前曾专程前往湖南拜访过刘重德老先生的时候,便为他的执著而大为感动。不过起初,玉良的兴趣似乎在哲学,他雄心勃勃想做翻译的本体论研究,而我给他的任务是先精通哲学本体论问题,然后向翻译本体论靠拢,直到对后者有所领悟为止。期间我鼓励他借鉴文学和艺术的顿悟思路,补充交际学的框架谋求突破。尽管后来玉良没有做本体论的题目(他只以此为题写过一篇论文,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的发言),但当他告诉我他决心选择《诗经》英译作为博士论文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觉得他做这个题目有三个条件:

1. 对哲学问题的执著追求和长期思考而不得的潜在动因。
2. 对诗歌,包括现代诗的快速领悟与直觉把握。
3. 还有,就是那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事实证明,玉良后来在做这个题目时比较得心应手,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只是由于国内条件所限,说高本汉的《诗经》全译

本找不到,我想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主要的本子找得到,就可以进行了。结果,玉良找到了八个英语全译本(其中有两个是同一译者的不同版本)和九个英语节译本。他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这些全译本上,同时参考了某些节译本,例如,结合杨宪益的《国风》节译本,说明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

那么,这个《诗经》英译研究有哪些特点呢?我觉得有如下的特点和贡献:

1. 首先,整个翻译研究是建立在国内的“《诗经》学”的研究基础上的。从先秦诸子的《诗》学到汉代《诗经》的确立,中间经过唐代的喻政宣礼,宋代的心性之学,清代的政教功能,一直到“五四”以来的文学研究的加强,和当代多元化的研究趋势,可以说对《诗经》的研究历史和主要资料比较熟悉了。这项研究大大地拓宽和加深了作者对《诗经》的理解和《诗经》翻译的认识,同时为《诗经》的文本理解和翻译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与学术基础。

2. 第二是对各种英译本所依据的底本的研究。本来,翻译研究和译作批评就应当包括版本的研究(参阅拙作《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相关内容),尤其是对于翻译所从出的底本的研究,但是近年来的翻译研究似乎不大重视底本的研究,尤其是一些西方当代翻译理论受某种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干脆不要原文了,只注重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不够的。玉良的研究,针对不同的英译本所从出的原本做综合考察,更进一步包含了译者所依据的各种参考文献,摸清了译者的底细,尤其是理雅各的文献多达 50 多种,为下一步的译本研究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这是值得称道的。

3. 其次是各个译本本身的研究及相互的比较研究。在一篇博士论文中涉及众多译本的研究,一般难以照顾周全,但作者是

有重点有观点的研究。他借助不同的理论观点洞悉不同的翻译现象,所以能使各译本的研究线索清晰,评价各得其所。例如,理雅各的译本注重经学传统与政教功能的发挥,注重中西宗教层面上的语词对接与替代,同时兼顾了《诗经》名物的历史真实性的传达。詹宁斯的译本兼顾儒家道德理想与以诗译诗的文学翻译原则,而阿连壁的翻译则体现西方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改变,又渗入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译本中,对原诗的诗歌形式改变较大。韦利的翻译通过意象转换和传达进一步加强了文学性,同时淡化了政治教化作用,使得《诗经》中的文化与民俗因素得到彰显,甚至深入到原始宗教与伦理思想的层面,因此具有更大认识和参考价值。意象派大师庞德的《诗经》翻译,则是典型的诗人译诗,注重转化和创造意象,而蒙太奇语言的使用,风格的多样化,美国民歌风格的借鉴以及中国和西方古典诗歌风格的模仿,被熔于一炉,服务于他独特的宣扬儒家思想和抨击西方政治的目的。除了不同时期的西方译者的翻译以外,作者特别选取了我国当代著名诗歌翻译家许渊冲和汪榕培的《诗经》翻译,他们的特点是:注重吸取和借鉴中国当代诗学的研究成果,尊重史料与文化价值的保持,注重汉诗审美特征的保留和传达,但在诗歌译文的语言创造和艺术性上贡献不多。

关于这八个译本的总体的比较研究,作者得出了如下的概括性的结论:

以上八个《诗经》译本的对比研究显示,尽管《诗经》居“六经”之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它的任何一个英译本都没有像所期待的那样,把元典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也没有像某些翻译理论所说的那样,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文化典籍就被以最严肃的态度,以最忠实的笔法进行翻译。从原文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英文译本

绝对准确地理解和翻译了《诗经》，更没有一个译本十分圆满地用英文表达了各个诗篇所表现出的特色鲜明的中国古代文化；而总是出于某种原因——或者理解的原因，或者语言差异的原因，或者文化差异的原因——与原文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艺术内涵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所以无论哪个译本，总是读起来部分像《诗经》，而部分又不像《诗经》。这似乎可以证明，翻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完美的。（见第八章小结）

4. 最后，就是论文的理论升华，直接论述到整合与变异问题。现在的翻译研究有一个特点或曰共性，那就是要涉及理论，如果自己不能设计理论，也要涉及一点别人的理论，否则不成为研究。其实研究是有众多类型的，有实证性研究，有理论性研究，也有鉴赏性、评价性研究。不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无论是何种研究都需要一定的理论背景和研究功底，否则就事论事，烦琐细碎，比较单薄。而理论可以是框架，也可以是观点，是洞见，甚至可以是叙述的语言和概念，不可以一概论之的。但是总归说来，却必须是方法，不能进入方法层面上的理论，是死理论和教条，充其量是装饰，于研究无补。仔细考察起来，就玉良的这篇《诗经》翻译研究而言，也可以说包含了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在内的：一个是《引论》中的方法部分作者明言的比较方法与综合方法，一个是各种学科的具体的研究方法，例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诗学的研究方法。没有这些方法，就不可能对现有的《诗经》研究和翻译进行分类和分析。

然而最重要的，却是一种我们最近几年在博士论文写作与答辩中所提出的称为“理论升华”的部分。所谓“理论升华”，它的基本意思是：在一个具有个案性质的研究中，如果不是事先确定要按照或借用一个固定的理论框架进行具体研究，至少可以

在一个研究(往往是具有综合性质的研究)之后,在基本的事实层面实证层面有所发现的基础上,就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个讨论可以对这项研究本身做出理论性的说明,而在更为理想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提出一种具有相当解释力的有较普遍意义的理论,至少可以提出一些此类研究所普遍关心的理论问题来。玉良的这项研究的理论升华,就是称为“整合与变异”的理论研究。事实上,他在论文写作中把“整合与变异”作为正标题而把《〈诗经〉英译研究》作为副标题放在下面,就体现了他的理论研究倾向。

在“整合与变异”的大标题下,玉良对于《诗经》英译研究做了理论的阐发,其要点如下:

1. 关于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作者认为,“翻译过程所有因素中只有译者因素是最活跃、最主动、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一切其他因素必须通过译者这个媒介才能对翻译真正发生作用”。(第九章)他分析了赞助人的作用和政治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认为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必须最终通过译者起作用,而译者既是被决定的,也有选择和决定作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译者主体性既不是译者决定论,也不是社会文化因素或意识形态决定论,而是一种体现多重关系和多因素的合力论和有条件的选择论。

2. 关于翻译客体:他认为翻译中的文本是意义的再生体,其实这里主要指的是原文本,而把整个翻译过程理解为是一个无限可以被理解和变异的过程。这里玉良借助解构主义观点阐明了自己的意思:“《诗经》译者虽然没有自觉地去‘解构’过《诗经》,但却往往是有意无意地陷入了解构主义的解读方式:每一位译者身上都体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这恰恰更清楚地说明了《诗经》文本内在的模糊性和意义再生性。伴随着历史的

脚步,《诗经》文本的距离性被进一步加剧,其间接性和模糊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可以预见,未来的《诗经》翻译仍会是一个‘异延’过程留下的‘痕迹’,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翻译,结果都是如此:若按经学传统来翻译,可以说是丰富了传统文化;若按文本内容翻译,则可以说是《诗经》文字‘异延’的延伸,是对《诗经》意义的不断丰富。”(第九章)

3. 关于翻译中的整合与变异:玉良借鉴了生物学上的变异概念和文化学上的整合概念,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整合与变异同时发生的过程,其中包含:文本的互文、语言的同化、诗学的交锋与交融,以及文化的冲突与会通等方面。这些方面或因素构成所谓整合与变异的多因素一体化过程,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思想火花。例如,关于诗学问题,他认为包括在宏观上诗学观念的渗透和微观上原作艺术的吸收,但二者又都是不彻底的、不全面的。这里就道出了翻译的居间性质和调停性质,以至于译文在文化上“将永远是一个既不完全像父亲也不完全像母亲的混血儿”。另一方面,作者也注意到整合与变异的方向和接受的条件问题。例如,在涉及语言同化的时候,作者认为一般的方向是译入语会向着源语的方向同化,但是,“源语语言因素的翻译越趋近目的语规范,与目的语之间互补性越大,与目的语文化的关联性和互补性越强,源语言因素就越容易为目的语所接受,反之就会遭到目的语的抵抗乃至排斥和抛弃”。(第九章)

从这个选题的研究结果来看,可以说,玉良的《诗经》翻译研究,是迄今为止一项比较系统而又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将对中国典籍《诗经》走向世界起到鼓与呼的作用,并对《诗经》学的研究起到补充和扩大的作用。在毕业后的一年里,作者又做了若干重要的修改,尤其是各章小结和最后的理论升华部分,下了较大的功夫,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如今这项成果就要以专著

的形式公开向社会和学界发表了,我怀着欣喜的心情,表示祝贺,也希望玉良在未来的道路上,潜心学问,精益求精,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最后关于希望和寄语一类话语里,我想谈两点个人意见:

其一,关于博士论文问题。概而言之,一篇博士论文的完成,充其量只是一个大体的宏观任务的完成,所谓“in partial fulfilment”(部分完成),而不意味着这个研究项目的结束。事实上,有的项目可能意味着作者在一定时期内自己规定的学术任务的完成,但更多时候,往往甚至只是个人的或整个学界学术兴趣的转移而暂时离开,在个别情况下,有的项目可能穷尽一生精力和时间也没有完成。所以在基本完成写作和答辩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如何公正而客观地对待每一个译本,也就是关于一个英译本的全面而准确的评价,这和在论文中把一个译本当作某一种典型案例做简要的评论是不同的。它实际上涉及论文的整体结构性论述与各个译本研究上的细化处理问题,有待于按照一个译本一个案例的原则,进行穷尽式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出客观全面而公正的结论。进一步而言,在深层的译本评价中,甚至需要注意到批评者的价值取向与翻译批评判断上的多元化与同一性的获得,而这种获得,除了需要对各种貌似相互冲突的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做原则性的协调统一的工夫外,还需要在学术思想上具备一个大而化之的整体观,通观历史深入现状的练达精神,和极为平和淡泊的学人心态。这些深刻的问题,在《诗经》和其他典籍的翻译研究中,却始终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甚至还没有被学界普遍意识到的问题。

最后部分的理论升华问题,一般标志着一篇论文的理论高度,在有的时候,也可能标志一个人一生学术所达到的研究高度,所以,不能小视之,而应当力求做得最好。至少在修改的时